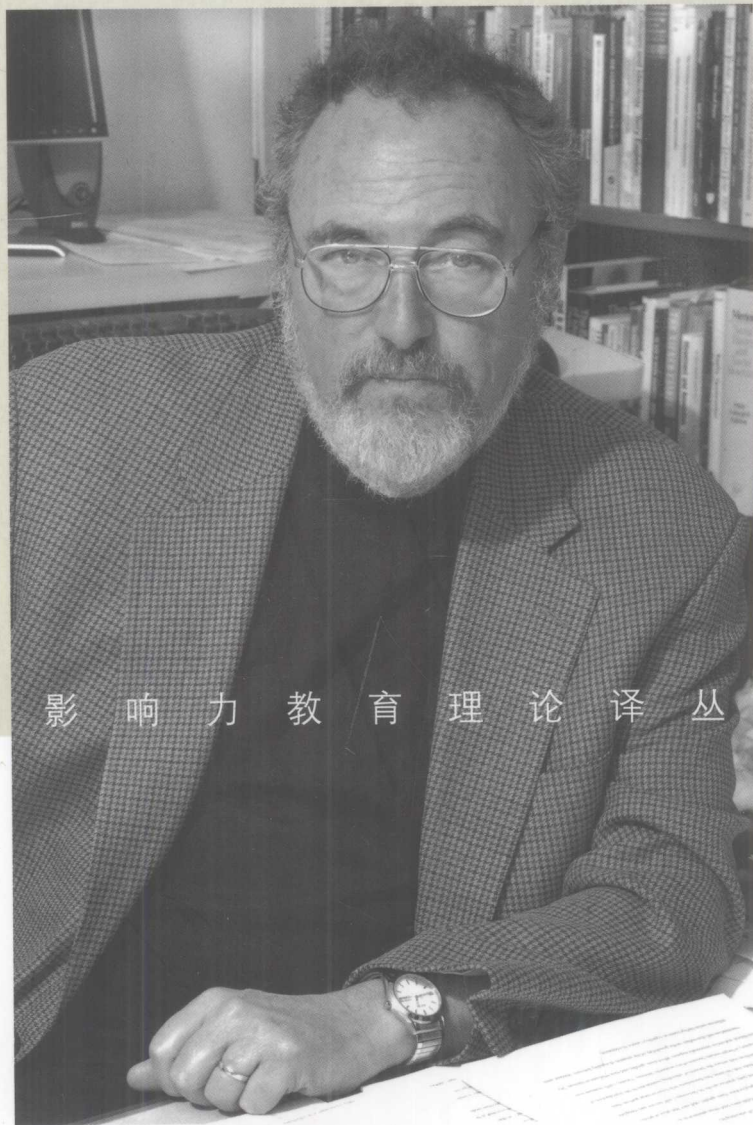


EDUCATING THE "RIGHT" WAY: Markets, Standards, God, and Inequality Second Edition



M 阿普尔 集
MICHAEL W. APPLE

影 响 力 教 育 理 论 译 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迈克尔·W·阿普尔 著
黄忠敬 吴晋婷 译
袁振国 审校

教育的“正确”之路

——市场、标准、上帝和不平等 (第二版)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M 阿普尔 集
MICHAEL W. APPLE

EDUCATING THE "RIGHT" WAY:

Markets, Standards, God,
and Inequality Second Edition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教育的“正确”之路

——市场、标准、上帝和不平等 (第二版)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迈克尔·W·阿普尔 著
黄忠敬 吴晋婷 译
袁振国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正确”之路/(美)迈克尔·W·阿普尔著;
黄忠敬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ISBN 978-7-5617-6250-9

I. 教… II. ①迈…②黄… III. 教育政策—研究
IV. G5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9560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

撰 著 迈克尔·W·阿普尔
译 者 黄忠敬等
审 校 袁振国
责任编辑 金 勇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5.25
字 数 371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250-9/G·3622
定 价 44.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阿普尔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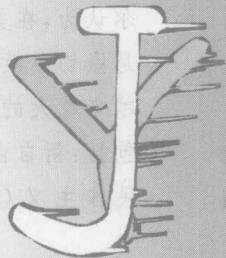
阿普尔集序

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这个名字对中国教育学术界来说已不陌生,1979年他出版了《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一举成名,此后一直活跃在教育著述的舞台上,至今仍然文思泉涌,笔耕不辍,展示了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批判教育家形象。

《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2001年首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多次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与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教育界的关注。目前在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著作有:《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教科书政治学》、《国家与知识政治》、《文化政治与教育》。为了让中国的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阿普尔的教育思想与理论,这次我们将阿普尔的著作集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阿普尔译丛包括《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官方知识》、《教科书政治学》、《国家与知识政治》、《教育的“正确”之路》、《被压迫者的声音》等共七本著作。这些著作是从阿普尔的30多本著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的绝大部分著作曾经被翻译成日、法、德、韩、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多国语言,还有一些著作获得了大奖,如《意识形态与课程》和《官方知识》入选20世纪最重要的著作,《教育的“正确”之路》被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著作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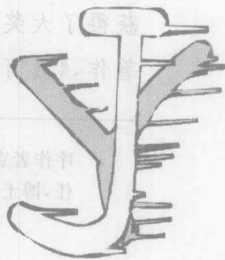
- 序作者袁振国,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丛中的每本书都独具特色,能够独立成篇,当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时,又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套经典译丛基本反映了阿普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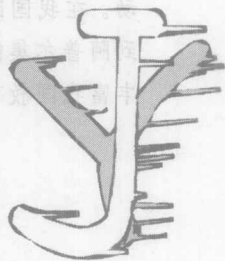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关注意识形态与课程。此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有《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和《教科书政治学》。《意识形态与课程》是阿普尔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课程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和技术问题,也不是一项中立的事业,它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问题,课程总是陷入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冲突的历史泥沼之中。为此,他针对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从而开启了探讨意识形态与课程关系的先河。在《教育与权力》一书中,他集中关注学校问题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他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学校场所以及师生如何抵制等问题,考察了各种被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非常重要的知识(技术管理知识)。尽管社会的经济水平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拥有高水平的技术,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用于经济的知识资本。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拓宽视角,借助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伯恩斯坦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分析了课程的内容和结构,它们如何被选择以及怎样被组织和传授等等问题,以此考察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教科书政治学》探讨了作为官方知识的教科书的作用,分析了教师的任务,指出教科书对妇女教师,尤其是小学的大多数教师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分析作为课程核心的教科书的政治属性。他尤其关注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和知识社会学,并且提出可以采取的政治行动。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批判保守主义的右派。在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有《官方知识》和《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一版)。阿普尔认为,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变革更趋向于保守主义。在英国是撒切尔政府时期,在美国就是里根政府时期。在保守主义势力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美国的教育政策基本被右翼联盟所控制。这个联盟包括: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s)、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s)和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New



middle class managerialism)。新自由主义认为凡是私的就是好的,而公的就是坏的,鼓励竞争与私有化,倡导择校与教育券这样的教育政策;新保守主义主张由国家来控制知识与价值,强调回到“传统”经典,倡导实施统一的国家课程和国家测验这样的教育政策;威权民粹主义有很深的宗教根源,它强烈支持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教育政策,同时强调家庭权威、伦理观念和基督道德的重要性,倡导家庭学校运动和在家上学的教育政策;专业管理的新中产阶级是一种新的管理主义,强调测量、评估、效率与标准的重要性,倡导绩效问责和高标准测验这样的教育政策。这四种力量形成保守主义的联盟,阿普尔称这四种联盟的势力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它们共同推动了择校、教育券、公立学校私营化、国家课程、全国统一考试等教育政策,《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法是这些教育政策得以合法化的标志。他认为:如果想理解如何变革学校,就必须向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学习,他们不是左派的人,而是右派的人。如果想理解如何进行反霸权的运动,就必须考察使用这些现代权力的人,考察很强势的、处于权力中心的右翼集团,考察他们所做的并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总之,这两本书聚焦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威权民粹主义和中产阶级管理主义的联盟,考察它们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人们接受它们。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以国际的视野拓展他的理论。在此阶段的著作有《国家与知识政治》、《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和《被压迫者的声音》。《国家与知识政治》重点关注国家的作用,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新加坡、瑞典、挪威、韩国、巴西等一些国家的案例,深入剖析国家与知识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官方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机构、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被传授,因此探讨学校知识必须考虑到知识的内外背景,也就是要与更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联。同时,本书也研究了帝国的文化政治学,帝国如何进行文化控制,殖民地的社会与文化动力是什么和社会运动怎样从底层向这种控制进行挑战以及社会运动本身的变化过程等等。《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章,在继续探讨保守主义右翼联盟的同时,对日益增长的家庭学校进行考察,并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体现出的新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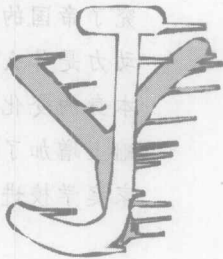


主义进行批判。本书既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很有实践价值的教育政策方面的读本,尤其对美国当前的教育政策与未来走向做了非常详实而有深度的分析与解读,对了解美国教育改革意义重大。《被压迫者的声音》更具国际化,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美国等英语国家的国际化教育实践。阿普尔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在教育领域中到底谁在说和做、有多大的说和做的空间、其效果和意义何在,从而揭示教育剧场中统治者与被压迫者到底是怎么“说”的。总之,此阶段阿普尔试图思考,对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国际化意味着什么,例如对南非、巴西、中国等等。他写了巴西 Porto Rico 成功的改革,他与巴西的人们一起工作,也在印度的新德里建立民主学校。他计划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做一些国际性的、成功的或强有力的民主教育的实验,并从事一些批判性的工作。其立场是西方必须向东方学习,北方必须向南方学习,保持谦虚的态度,少些傲慢。

阿普尔的教育思想深受马克思、葛兰西、布迪厄、伯恩斯坦等思想家的影响,又来源于家庭成长的背景;他既是一位深邃的理论家,又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既是一位教育问题的批判者,又是一位民主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他的工作主要是探讨教育中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对教育的影响,检查课程的意识形态、知识和权力等的复杂关系,批判课程中的阶级、种族与性别等问题。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意识形态与课程的关系是什么?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什么是教育的“正确”之路?受压迫者有发言权吗?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分析教育与课程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批判教育理论和新左派的著名代表,阿普尔始终坚信自己的理念,猛烈批评在美国复兴的右派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积极倡导教育民主之路。尽管他知道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革命”,但他还在不知疲倦地为之奋斗。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思考,而且是一种实践上的行动。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很高兴看到阿普尔集能够及时地与读者见面,相信这套译丛对繁荣我国教育思想、丰富我国教育理论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会有所启示。

吴晓军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丛书主编 袁振国 谢维和 徐 辉 张斌贤

选编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杰人 阮光页 张斌贤 金 勇
袁振国 徐 辉 谢维和

总

序

// 总 序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的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和作家,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这中间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也希望不避烦难,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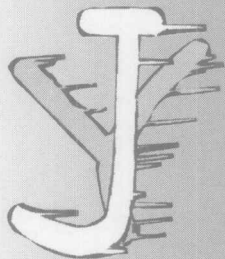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

徐 辉(浙江师范大学)

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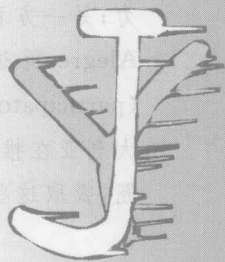


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新世纪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是美国教育改革的“正确”之路？这些都是《教育的“正确”之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书是阿普尔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所开展的一项新的工作，这项新的工作既是阿普尔近30年来对美国教育政策反思与批判的继续，又是对前期工作的拓展与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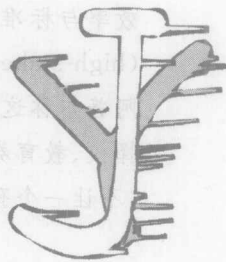
在保守主义势力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美国的教育政策基本上被右翼联盟所控制。它们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s)、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s)和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New middle class managerialism)。新自由主义认为凡是私的就是好的，而公的就是坏的，鼓励竞争与私有化，倡导择校(school choice)与教育券(voucher plans)这样的教育政策；新保守主义主张由国家来控制知识与价值，强调回到“传统”经典，倡导实施统一的国家课程和国家测验这样的教育政策；威权民粹主义有很深的宗教根源，它强烈支持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教育政策，同时强调家庭权威、伦理观念和基督道德的重要性，倡导家庭学校运动和在家上学的教育政策；专业管理的新中产阶级是一种新的管理主义，强调测量、评估、效率与标准的重要性，倡导绩效问责(accountability)和高风险测验(high-stake test)这样的教育政策。这四种力量形成保守主义的联盟，阿普尔称这四种联盟的势力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它们共同推动了择校、教育券、公立学校私营化、国家课程、全国统一考试等教育政策，《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法是这些教育政策得以



合法化的标志。

这种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改变公众的“常识”(common sense)并推行教育改革的议程,是因为它们成功地采取了战术性的策略,如重新界定一些教育的“关键概念”,包括书名副标题上所显示的“市场”、“标准”、“上帝”和“不平等”等等。阿普尔写作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质疑右翼界定这些意义和改变公众常识的合法性,他指出:“右翼的语言在排斥其他人的语言时如何突出像‘真实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他们倡导的政策的结果如何?来自各种右派集团——如通过教育券计划来进行教育市场化、施压以‘回归’到西方传统和假想的共同文化、致力于让上帝回到美国学校和课堂以及国家与州的课程和测验(常常是‘高风险的’)——的看似矛盾的政策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推动着诸多的右派议程向前发展?”(英文版第9—11页)。回答这些问题成为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

面对右翼的成功,阿普尔号召,“既然右翼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阿普尔呼吁,不能简单地批判和毫无意义地抵制右翼,而要向右翼学习。向右翼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中断右翼联盟,纠正右翼的错误,实施进步主义的教育改革实践。他勾画了一幅进步主义改革的蓝图,包括让批判教育学更加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更快速地和更广泛地发表研究成果,在有共同基础的右翼与左翼之间形成战略性的联盟,切切实实地解决每位教师都感到困难的一个老问题“星期一做什么?”等等。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强调的,“本书的兴趣并不是简单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假设和政策,而是需要认真地考察进步主义改革的可选择性的路径”(参见中文版序言)。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理解美国国内的民主学校运动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民主学校》中所阐述的民主学校改革以及《重新思考学校》等等的努力;另一方面需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如巴西的 Porto Alegre 所进行的“公民学校(Citizen School)”和“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教育改革措施。同时需要避免英格兰、澳大利亚在推行类似于美国教育券、择校计划、标准化考试等时出现的问题,吸取这些国家在教育改革中失败的教训。总之,进步主义改革要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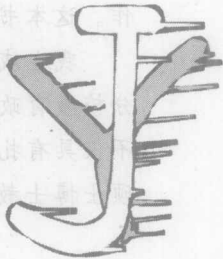


得成功,不仅需要虚心地向右翼学习,向左翼已经取得的民主斗争的经验学习,而且需要切实地向国外学习。

理解阿普尔所提出的进步主义的改革方案还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那就是重新改变立场(repositioning),即必须从那些拥有最小权力的人的立场来理解任何制度、政策和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中太多的有关教育券和选择计划以及国家或州的课程、标准和测验的教育改革话语不仅不能导致保守主义者所声称的教育平等,而且再生产或恶化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因此,现存的经济和文化权力结构通常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在开始一些教育者或立法者想把事情做好的企图,结果却通常转变为社会成层化的另一套机制。学校课程实质上也变成了一个战场。新自由主义抱怨“经济上无用的”知识,新保守主义痛惜所谓学科的丧失和“真正知识”的缺乏,宗教威权的民粹主义无情地攻击学校丧失了上帝赋予的“传统的”价值,受到这些因素的很大刺激,对什么应当在学校被教授以及如何教的讨论现在在我们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对中国教育市场化、功利化、工具化倾向均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对中国未来教育改革政策的发展方向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书题目中的“Right”在英文语言中包含两层意思:(1)正确或者做事的正确方式;(2)指右翼人士或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双关语,在本书中都有这两个意义。考虑到“右派”是个极强的政治术语,在中国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容易发生混淆或误用,也考虑到在中文中不可能找到一个既表示“正确”又表示“右翼”这样的对应词,所以在翻译此书书名时只取其中的第一要义。这与本书的内容基本相符,也与著作的主线相一致。阿普尔正是在对右翼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什么是教育的‘正确’之路”这个主题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才是真正的目的。相对前者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

本书是继《意识形态与课程》和《官方知识》等诸多著作之后阿普尔的又一部新世纪力作,在2001年出版了第一版之后,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泛关注,被译为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文字。在2006年又出版了第二版(增加了两章),本书就是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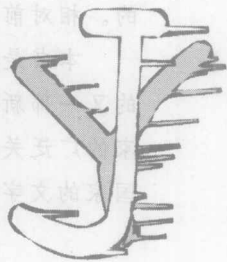


第二版来进行翻译的。它既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很有实践价值的教育政策方面的读本,尤其对美国当前的教育政策与未来走向做了非常详实而有深度的分析与解读,对了解美国教育改革意义重大。

最早承担此书的翻译工作时,译者正好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访问学者,阿普尔是译者的合作教授,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翻译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在翻译此书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得到阿普尔教授的关注与帮助,我们不仅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谈,而且在我回国后通过 E-MAIL 仍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与沟通。回国后不久,我又作为一名志愿者到西藏民族学院支教,在承担一些管理与教学方面的工作之余,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翻译工作,所以这本书的翻译是在断断续续中完成的,前后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起笔于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收笔于西藏民族学院。本书似乎见证了我这几年“东奔西走、变动不居”的生活。幸运的是,诸多领导、同事、自己的研究生和家人都从不同的方面支持了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可爱的儿子,我工作之余一个人独处时,时常会想起他那张稚嫩的脸蛋,这会让我顿时感觉疲劳殆尽、精神振奋。还有我们经常通过 MSN 的视频所进行的“对话”,从不会说话时看到电脑视频上“爸爸”的咯咯笑声,到现在会拿着自己的玩具到电脑前向我“炫耀”,尽管现在才刚满三岁,但我觉得他已经长大了。这种网上交流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总算还没有忘记掉这个经常不在身边的爸爸。只是妻子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家务,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同时要感谢的还有教育部中央教科所的所长袁振国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金勇副编审。袁老师一直非常关心本书的翻译工作,尽管很忙,他还是抽出时间亲自承担起本书的校订工作,精益求精。金勇副编审的时常关心、帮助与提醒使我能够按时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这本书也有他们的贡献。

我在威斯康辛大学访学期间,很荣幸结识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政策系的吴晋婷博士,我邀请她与我一起承担翻译工作。她不仅具有扎实的教育理论素养、娴熟的英语水平,而且多年在西方接受硕士博士教育的学术背景使她在承担这项工作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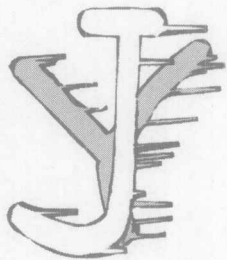
她的认真而细致的翻译工作着实让本书增色不少。她承担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翻译工作。其余各章及相关内容,均由我承担翻译。最后,由我来统稿修订,袁振国教授对全书进行了审校。

尽管在翻译此书之前我曾经翻译过阿普尔的另外两本著作(《意识形态与课程》、《国家与知识政治》),对他的写作风格与行文方式比较适应,但在翻译此书过程中,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轻松。大量的引文、注释与诸多的概念名词有时不得不让人绞尽脑汁。尽管翻译时字斟句酌,但可能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还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黄忠敬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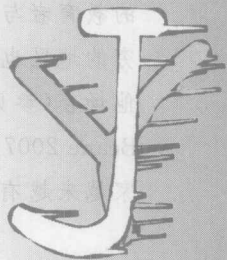
中文版序言

// 中文版序言

在过去十年里,我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在中国体会到的一件事情是教育者和公众对建立和保护有价值的教育的极大责任感。但是这不只是我了解到的唯一经验。我在中国所体会到的另一点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理由。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一书中所进行的绝大部分争论是建立在对美国、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类似的国家中的诸多重要的教育改革背后的假设和现实进行非常仔细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我没有假设我在这里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这些改革在中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或者由同样的政治而产生。

然而,中国对利用这些改革经验为自己的教育政策服务很感兴趣,因此我相信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教育者和批判学者要理解当这些政策在其他一些国家被付诸实施时已经产生的显在和潜在影响。考虑到现在中国正发生的特殊的转型和对社会内部和城乡地区之间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的担忧,这种警示在现在比以前更加重要。

《教育的“正确”之路》继续批判性地考察我所开展的社会与制度性的运动以及其后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教育和社会政策与实践。因此,它是我的系列丛书如《文化政治和教育》(1996)、《官方知识》(2000)和《国家与知识政治》(2003)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著作都已经被译成了中文或正在翻译过程中。尽管《教育的“正确”之路》继续并拓展了我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但是它对于许多国家中被视作“常识”(common sense)的假设和政策进行了最到位的批判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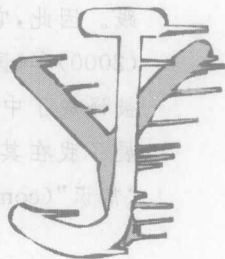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看起来冲突性的教育政策的结合现在成了主流。教育系统发生了变革(在某些国家,非常地彻底),因此竞争和市场化得到提倡。“消费者选择”将可能保证更好的结果。这通常联合着对期望产生更高标准的国家测验和国家课程的重新强调。另外还有不断增长的对业绩、证据和问责的压力——被称之为“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在美国尤其要补充的最后一个因素,我称之为“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它强调保守性的宗教学校教育;它的支持者与强烈支持教育市场的那些人已经结成了联盟。

各种立场的这些支持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联盟,一个新的霸权集团,我与许多其他的人都认为它把教育推向了非常危险的方向。这些立场的倡导者都主张沿着他们的路线来改革教育将保证对每个人来说更好的结果。正如《教育的“正确”之路》所阐述的,这并非事实。

本书关注权力的多层因素。我希望用全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综合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分析。但是它也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宗教和类似文化因素的权力以及它们与其他权力因素的联系。它也要求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社会运动的批判上,其中的一些是进步性的,而另一些是退步性的。这个分析相当复杂。但它是现实。我们这些致力于批判性地理解教育现在做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的人不能简单地假设,对不同的权力的简单说明足以描述和影响现实。

正如你将在本书看到的,我的兴趣并不是简单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假设和政策。针对现在被接受的常识,我也需要认真地考察进步主义的可选择性路径。就这一点而言,我指出在巴西的Porto Alegre 和在美国的民主学校运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前者已经发展了一系列的持续性的进步主义的教育改革,其焦点集中于“公民学校”和“参与式预算”。后者也阐述了即使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有责任的教育者与社区、社会运动和进步主义领导者进行合作,在即使非常贫穷的地区也能够建立民主和批判取向的强有力的教育模式。尽管在其他场合(参见: Apple, et al. 2003; Apple and Buras 2006; Apple and Beane 2007)对这些可选择性路径已经说了很多,但是理解针对许多国家越来越有问题的政策和实践提出可行性的选择性路径是非常重



要的。

正如我在开头序言中强调的,我在中国进行的体验不断地教给我很多东西。《教育的“正确”之路》的翻译是跨越国界开展不断对话的另一个步骤,这一步或许能够开发批判性的知识与政治资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如我在以前我的中文版著作中说的,我希望我的批判性研究能够帮助中国学者和教育者用引人入胜和强有力的方式来反思他们自己的现状。我的这本书也有同样的希望。

Michael W. Apple

John Bascom Professor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参考文献

Apple, Michael W. (1996). *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Apple, Michael W. (2000).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Apple, Michael W., et al. (2003).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Apple, Michael W. and Beane, James A. (eds.) (2007). *Democratic Schools: Lessons in Powerful Education*.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 Heinemann.

Apple, Michael W. and Buras, Kristen. L. (eds.) (2006). *The Subaltern*

Speak: Curriculum, Power, and Educational Struggles. New York: Routledge.